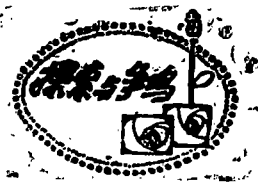


论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续完)



吴 琼

二、综合的方法和“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

克劳塞维茨在提出“绝对战争”学说之后立即运用综合的方法提出“现实战争”的学说。其所以如此，并不是象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那样，说明抽象的“绝对战争”概念“外化”或“派生”出了现实世界中的战争，也不是象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或二元论哲学那样，说明“绝对战争”怎样成为“现实战争”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而是沿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由揭露战争一个方面的本质属性进入揭露战争更多方面的本质属性、由揭露战争的一级本质进入揭露战争更深刻本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从而说明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说明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三位一体”即包括暴力现象、军事现象在内的社会政治现象。

克劳塞维茨在提出“绝对战争”学说之后，实际上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绝对战争”构成了“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出现这种战争呢？克劳塞维茨从《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二章第六节开始，为我们作出了回答。他开始运用综合的方法，联系大量战史经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以探讨战争在“有阻力”情况下的运动规律，亦即开始系统地揭露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

第一，克劳塞维茨在第六节至第十一节阐明：“绝对战争”之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出现，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并不是由单纯的“暴力”子系统构成的。在现实战争中除了有一个“暴力”子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政治”子系统。并且从大量的战史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战争中的“社会政治”子系统始终在整体上制约着“暴力”子系统和“军事”子系统，不仅战争的“政治目的”在制约着“暴力手段”和“军事目标”（“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②4}），而且，战争的“政治目的”、“暴力手段”和“军事目标”在整体上还要受到产生战争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的支配（“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②5}）。

上述事实说明，现实世界中的战争除了具有“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绝对战争”的本质属性之外，还具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政治工具的从属性”在整体上对“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的制约和限制，也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现实世界中的战争不可能表现为单纯的“暴力”形态，为什么现实战争很少按照“绝对战争”的方式进行，“为什么

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②⑥}

第二，克劳塞维茨从第十二节至第二十三节，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阐明：如果仅仅考察战争的“军事”子系统，即把战争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活动，那么，可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种“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的“自由的精神活动”，所以“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②⑦}但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活动，而是由“暴力”子系统、“社会政治”子系统和“军事”子系统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②⑧}；因此，决不能在整体上也把战争运动看作是一场“赌博”。

克劳塞维茨还认为，在现实战争中，尽管在“暴力”、“社会政治”和“军事”这三个子系统中间存在着种种力量的复杂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来，“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②⑨}这也就是说，在构成现实战争的三个子系统中间，“社会政治”子系统始终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是战争矛盾整体中的主要矛盾；由于这个主要矛盾在现实战争中始终存在，也就决定了战争的运行既不可能呈现为单纯的机械必然性，也不可能呈现为单纯的概然性和偶然性，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客观规律性。^{③⑩}

第三，在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分析了构成现实战争的三个子系统的本质属性之后，克劳塞维茨终于在第二十四节至第二十八节作出理论概括。他认为：

（1）战争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③①}。

透过现实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的整体性质是由“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绝对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这三重本质属性组成的；“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③②}这也就是说，从横断的、相对静止的角度分析，战争的本质属性并不是单一的、死板的，而是由不同比例的三重属性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或“绝对战争”并非现实战争的本源，也并非游离于现实战争之外，而是寓于现实战争之中；在现实世界中，一切战争都毫无例外、但程度不同地具有“绝对战争”的本质属性。

（2）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③③}

在构成现实战争整体性质的三重本质属性中间，“政治工具的从属性”始终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而且“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③④}这也就是说，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分析，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并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复杂而多变的”^{③⑤}；是随着战争的“政治目的”和产生战争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一定要通过具体的战争形态而表现出来。有时，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和形态接近“绝对战争”，但有时，又与“绝对战争”相距很远[“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磨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③⑥}；“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

争离开它的自然倾向就越远”^{③7}】。

(3)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③8}。

无论战争的具体性质和具体形态怎样多变，但就其共同具有的系统本质、系统功能和系统规律而言，“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③9}——这就是现实战争的实质，也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克劳塞维茨于是要求，应该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全部战史、认识战争并建立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础。^{④0}

总之，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层次的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而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又各具不同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因此，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复杂事物切割开来，分别地考察每一个子系统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然后，才能确定它们在该事物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最后综合出该事物的系统本质和运动规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由“绝对战争”领域上升到“现实战争”领域的过程，既是对构成现实战争的三个子系统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进行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又是在思维中概略地复制战争内部各方面的本质联系，从而初步形成“战争的总概念”^{④1}的过程。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的“现实战争”是想说明，战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暴力活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活动，而是一种包括暴力活动和军事活动在内的社会政治活动，是一种其内部整体性质和外部形态特征随着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战争观，空前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现象的实质，揭示了战争环境、战争性质和战争形态相关变化的客观定律，是十九世纪人类在军事科学史上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是认识上的创造性的突破。因此，它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科学史上取得伟大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仅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今天看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在由“绝对战争”领域上升到“现实战争”领域时所使用的综合方法，实际上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方法。他之所以在提出“绝对战争”学说之后，紧接着又提出“在现实中的修正问题”；他之所以在提出战争“赌博论”之后，紧接着又提出战争“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问题；就是要求抽象战争理论的逻辑发展必须不断地接近现实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必须按照现实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加以“修正”，以便使他的战争理论不脱离战争实际。关于这种方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克劳塞维茨曾在“作者自序”中作过明白的表述。^{④2}

过去，还有人把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说成是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或二元论哲学的产物，把“绝对战争”说成是“现实战争”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例如，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认为：“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④3}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因为克劳塞维茨虽然受到“康德主义者”基塞维特哲学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新发现的材料证明，基塞维特的哲学思想与康德哲学又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属于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④4}例如，仅就“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的关系而言，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已经阐明：“绝对战争”构成了现实战争的三方面本质属性之一，乃是现实世界中一切战争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或自然属性；只不过由于以往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战争难以克服其内部（“军事”子系统）和外部（“社会政治”

子系统)的“阻力”,不可能在外部呈现为“绝对战争”的形态罢了。但是,克劳塞维茨也曾明确地指出,并非所有的现实战争都不可能呈现为“绝对战争”的形态;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具体形态归根结底是由产生战争的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如果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现实世界的战争……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④，“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⑤由此可见,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中,“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观念,并不是“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那种把“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简单地归总为康德哲学并否认“绝对战争”客观实在性的意见,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三、从“绝对战争”到“现实战争”、再到“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最后一篇“战争计划(草稿)”中,运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方法,鲜明地提出“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的学说。他之所以最后提出这一学说,一方面是为了从逻辑的角度把战争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描述完整,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战争理论;另一方面,是试图以“绝对战争”、“现实战争”、“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学说为契机,从历史的角度具体地追究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战争的形态变化、性质变化和战略决策方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相关机制,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战略决策方法,以便使自己所制定的战争计划最终符合于时代的要求和客观真理。由此看来,弄清“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学说,乃是弄清克劳塞维茨全部战争理论及方法论实质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其实,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沿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在《战争论》的第一篇从“绝对战争”领域上升到“现实战争”领域时,在第二篇至第七篇对构成战争的各个要素、部分或环节作系统分析时,已经从各个侧面论述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问题”^⑥。但是,只是在《战争论》的第八篇其战争理论重新“回到战争这个整体上来”的时候,他才着眼于如何实施战略的决策并制定战争计划,鲜明地提出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学说。

克劳塞维茨是紧密联系是否应该制定战争计划、以及应该制定怎样一种合理的战争计划问题,重新提出“绝对战争”、“现实战争”以及“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学说的。他认为:

第一,如果我们要坚持按战争的概念(“搏斗”)作严格的推论,那么,只能得到一种“绝对战争”。在“绝对战争”中,暴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产生停顿和间歇,战争是一个各个部分不可分割的整体,胜负只取决于最后结果。基于这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绝对战争形态”,人们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战争计划,并且在战争中严格地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克劳塞维茨认为,对战争形态和战争计划的这种机械论的看法,虽然“从[战争的自然]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完全适用、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况很少。^⑦

第二,因为现实战争与“绝对战争”不同,“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⑧。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战争要受到种种阻力的节制,这些阻力便使“战争具有一

些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⑤①}基于这种现实战争形态,从以往大量的战史经验来看,人们往往看不到“绝对战争”寓于现实战争之中,往往忽视战争的整体性和必然性,“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象赌博中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输赢并没有影响”^{⑤②},“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常会完全不起作用”^{⑤③}。因此,人们也就认为在战争开始以前不必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战争计划,在战争也不必按照计划采取行动,而只是在战争场上追逐偶然遇到的“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⑤④}。

克劳塞维茨认为,对战争形态和战争计划的这种怀疑论的看法,正是拿破仑战争时代以前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从历史上看来是正确的”(自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到处都适用、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况也很少。^{⑤⑤}

第三,为什么说对战争形态和战争计划的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大正确呢?克劳塞维茨回答道,因为我们目前正处于拿破仑战争时代,一种崭新的、“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出现了。他说:“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⑤⑥}

这也就是说,在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拿破仑战争时代,在拿破仑战争这种“现实战争”之中,“绝对战争”的形态特点已经全部真实而典型地出现了!“绝对战争”已不再是由“思想实验”的方法推导出的一种抽象理论结果,而是一种在现实中世界确实存在的,可以由经验所检验和肯定的客观事实了: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学说并不谬。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⑤⑦}

但是,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拿破仑战争并不是“绝对战争”的简单重复或复归,它仍然是一种受到“军事”子系统和“社会政治”子系统制约的“现实战争”^{⑤⑧};只不过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中“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⑤⑨},于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呈现为“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即一种崭新的“绝对战争”形态。

第四,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欧洲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战争不可能克服种种“阻力”而“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⑥①};而拿破仑战争却能克服种种“阻力”,从而获得“绝对的形态”^{⑥②}呢?——克劳塞维茨系统地总结了欧洲战史经验,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战争的“政治目的”和产生战争的社会政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并由此引起战争整体性质的变化而造成的。他的主要观点是: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以前的欧洲封建社会中,战争“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人民很少参加战争;“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限了”,“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⑥③}

而到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迅速转化的拿破仑时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

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⑤③}“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⑤④}

第五，基于拿破仑战争的出现，克劳塞维茨在战略决策方法上强调必须制定战争计划、而且必须制定一种既具有内在联系而又估计到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可能会出现“极端的不幸”^{⑤⑤}的“绝对战争”形态之战争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但是，由于我们目前正处于拿破仑战争时代，“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⑤⑥}，所以，“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点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⑤⑦}

克劳塞维茨紧密联系历史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总结道：在1805、1806和1809年的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正是因为不了解战争环境、战争性质和战争形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没有立足于“绝对战争”的形态并制定出一个与此相应的战争计划，所以，才在战争中遭到了惨败^{⑤⑧}！

第六，在具体追究了历史上战争形态，战争性质和战略决策方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相关机制之后，克劳塞维茨又把研究战争现状与预测战争将来的方法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应该把“现实战争”明确地划分为两种典型：一种是“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⑤⑩}，亦即“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另一种是“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的战争”，或者叫作“有限目标”的战争^{⑤⑪}。克劳塞维茨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两种战争之间必然有一些过渡性的战争，但是这两种战争的完全不同的特点必然贯穿在一切方面，其中互不相容的部分也必然会区分出来。”^{⑤⑫}“基于上述战争理论，他在《战争论》的最后几章中，紧密联系当时欧洲和德国的社会现实，分别草拟了“有限目标”的战争计划和“以打垮敌人目标的战争计划”^{⑤⑬}。据史学家们考证，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最后一章所制定的“以打垮敌人目标的战争计划”，已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普法战争中得到了辉煌的验证！^{⑤⑭}

总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最后第一篇“战争计划(草稿)”中，一方面继续沿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在“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学说，由于这个学说沉积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自初步确立起所经历的各个逻辑发展阶段上的内容，因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具体”^{⑤⑮}，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⑤⑯}的“战争的总概念”，它标志着克劳塞维茨的学说确实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欧洲长期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直至拿破仑战争中的战争经验，具体追究了历史上战争形态、战争性质和战略决策方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相关机制，而且别开生面地把问题引向一种应用性的战略决策方法，联系现实制定出两种具体的“现实战争”计划，这就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确实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应用性，乃是自觉地为解决当时德国现实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服务的。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议论，即认为克劳塞维茨提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的最终目的，是无条件的鼓吹“总体战”、“无限战争论”或“无限暴力论”，有些学者甚

至认为克劳塞维茨应该对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例如，英国学者富勒认为：克劳塞维茨“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朝这一方向去指导”，“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入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⑦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克劳塞维茨本人从未说过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绝对战争”形态的方向去指导；相反，他在《战争论》中反复强调的是：“理论应该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⑧在判断战争的形态和指导战争时，永远要考虑“时代的特点”和“产生战争情况的多样性”^⑨，

“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⑩；关于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以后是否又会出现“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问题，他曾经明确地回答道：“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⑪更何况自从克劳塞维茨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之所以会发生一系列所谓“总体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怎么能够让克劳塞维茨负责呢？问题的实质在于，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高踞为社会统治阶级以后，“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⑫，不少资产阶级军事家对于一个本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军事哲学家的深刻思想已经很难理解了。正如国外某些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那些实际上想打绝对战争的军人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所论述的这个抽象理论，总是不加鉴别地和断章取义地去理解，尽管战争具有逐步升级达到最大限度的暴力的倾向，但克劳塞维茨本人承认并叙述了许多能够阻止战争发展到完全或绝对的因素。所以把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与现代的总体战混淆起来，这是严重的错误”。^⑬

综上所述，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对军事科学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个学说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糟粕，例如，克劳塞维茨对构成战争并决定战争发展的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缺乏研究和分析；他在论述自己的战争学说时常常使用一些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术语……但是，“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⑭，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毕竟惊人地揭示了战争发展的客观逻辑趋势，初步揭露了战争现象的实质和运动机制，把西方军事思想空前地综合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军事哲学。

注释：

①②③《战争论》，第33、34页。

④⑤⑥《战争论》，第46、41、42、43页。

⑦参见吴琼：《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战争论〉中的‘概然性’理论——与李际均同志商榷》（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1期）。

⑧⑨《战争论》，第46页。

⑩⑪⑫⑬《战争论》，第46、45、48、43、44页。

⑭⑮⑯《战争论》，第43、45页。

⑰《战争论》，第851页。

⑱参见《战争论》第17页。

⑲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75页。在我国，李际均及傅立群同志持有同类观点，请参见李际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14期）及傅立群：“谈《战争论》中的不可知论幽灵及其它——与吴琼同志探讨”（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

优秀论文 (续完)

(本期共公布7篇)

(1)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是怎样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作者 郭小坚, 学报1988年第2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自然辩证法》1988年第5期。

(2) 《对国情的探索推动青年毛泽东成长》，(作者 沈郑荣, 学报1988年第6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1期。

(3) 《略论主体意识的选择性结构》，(作者 志斌 琢璐, 学报1989年第1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89年第6期。

(4) 《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对象思想内化规律探析》，(作者 金家林, 学报1989年第1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第6期。

(5) 《努力探索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作者 杜铁环, 学报1989年第1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第6期。

(6) 《阶级标准的误区与生产力标准的思考——兼论洋务派的进步性》，(作者 范大章, 学报1989年第1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6期。

(7) 《实践分类探析》，(作者 隋军, 学报1989年第2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89年第6期。

④参见吴凉、张元林：“基塞维特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思想”（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

⑤⑥《战争论》，第43，895页。

⑦参见《战争论》第一篇第二章；第三篇第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第四篇第二章；第五篇第九章、十三章、十四章；第六篇第二十六章、二十八章等等。

⑧《战争论》，第852页。

⑨《战争论》，第854，859，860页。

⑩⑪《战争论》，第50，854，855页。

⑫⑬⑭⑮《战争论》第860，857页。

⑯《战争论》，第855，856页。

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8页。

⑱参见《战争论》，第857。

⑲《战争论》，第874页。

⑳㉑《战争论》，第859页。

㉒《战争论》，第870，871页。

㉓《战争论》，第249，876，874页。

㉔《战争论》，第902页。

㉕㉖㉗㉘《战争论》，第862，876，877，857页。

㉙参见《战争论》第862页。

㉚㉛㉜㉝《战争论》，第11，888，913页。

㉞参见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之注释125，《列宁军事文集》，第732页。

㉟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4，215页。

㊲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㊳㊴㊵㊶《战争论》，第877，862，876页。

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㊸小戴维·佐克：《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1页。

㊹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